

日本所編  
明人詩文選集綜錄

陳廣宏 侯榮川◎ 編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日本所編 明人詩文選集綜錄

陳廣宏 侯榮川 ⊙ 編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RIBEN SUO BIAN MINGREN SHIWEN XUANJI ZONGLU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所編明人詩文選集綜錄 / 陳廣宏，侯榮川編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598-0982-7

I. ①日… II. ①陳…②侯…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明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明代 IV. ①I214.8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126529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號 郵政編碼：541004）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張藝兵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廣大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桂林市臨桂區秧塘工業園西城大道北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  
有限公司創意產業園內 郵政編碼：541199）

開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張：25.75 字數：163 千字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150.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發行部門聯繫調換。

天文  
縱成

# 前 言

陳廣宏 侯榮川

以現代歷史學的觀點，自十五世紀末至十七世紀，人類足跡得以跨越大洋而進入不同的文明大陸，世界也由此進入早期全球化時代，這導致包括東亞在內的世界原存的秩序被打破，在新的國際環境中開始近代化進程。不過，相對於物的交流，文化跨越大洋而構建起洲際的穩定聯繫則要困難得多。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近世以來全球化大趨勢下，更為複雜的域際交流，仍然是以幾個大的區域的形式存在。與經濟貿易相扭結的漢籍文獻（包括中國本、和刻本、朝鮮本、越南本等）“環流”傳播，使得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東亞漢字文化圈成爲一種更為穩固的區域文化存在。在當今試圖建立多種模型去認識的時代，我們應該持何種態度、立場去構建歷史及現時的自我存在，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東亞作爲歷史上擁有諸多共同經驗的整體，在美學價值、文學形態上皆有其共享的一面。如漢詩文寫作，在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均曾作爲精英文學的主流形式存在；諸國使節來華及中國官員出使，也有與當地文人酬和交流乃至競技爭勝的歷史傳統。文學如何習得、如何競演？諸多文本如何被改造、如何傳播？東亞漢詩文是從中國這個根系衍生而出，此後所展現出的差異形態則印證了其在不同方向上進行拓展的可能性。因此，十五世紀末以來近世化過程中東亞漢詩文相關文獻的整理與

研究，無疑成為今天“在多面鏡中認識自我”<sup>①</sup>，重構中國古典文學歷史鏡像的重要環節。

### 一、漢籍的傳入與日本漢詩文接受

據《古事記》《日本書紀》《隋書·東夷·倭國傳》《宋史·外國·日本國傳》等的記載，漢籍傳入日本最早是應神天皇(270—312)時：“十五年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伎貢良馬二匹……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所謂王仁者，是書首之始祖也。”(《日本書紀》卷十)《古事記》則記：“和邇吉師，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並十一卷付是人即貢進。”《千字文》為梁武帝時期(502—549)周興嗣奉敕編纂成文，故此說多為學者所懷疑<sup>②</sup>。

早期傳入日本的漢籍主要是經史、佛典與類書等文獻，文學作品的傳入稍晚於此。718年，元正天皇設立大學寮，主要學習儒家經典。728年，大學寮增設“文學道”，置文學博士，以《文選》《爾雅》為教科書，其制度與唐代進士科相似。嵯峨天皇更將文章博士置於其他博士之上，提高了漢詩文的地位。中國詩文傳入日本雖晚，但其傳播的數量、規模却頗為可觀。《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為藤原佐世於寬平三年(891)奉敕編纂的漢籍分類目錄，分易家、尚書家等四十類，著錄當時日本所藏漢籍1579部，17106卷(一說17345卷)。其中除第卅雜家計2617卷外，以卅九別集家1568卷、卅惣集家1568卷為最多，合第卅八楚辭家32卷，詩文著作計3000多卷，占

① 參見葛兆光《預流、立場與方法——追尋文史研究的新視野》，黃頌傑主編《光華文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復刊30周年論文精選》“史學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10頁。

② 如大庭修云：“相傳，和邇吉師(王仁)自百濟攜來《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時至今日，也許不會再有人將此傳說誤解為歷史事實，例如認為日本在此之前尚無書籍，或此時傳來之書祇有《論語》和《千字文》兩書。”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邵毅平引日本學者豬口篤志《日本漢文學史》“一般認為雄略以前的‘記紀紀年’約有六百年左右的水分”的觀點，認為：“王仁赴日應該遠晚於285年，而是遲至五世紀以後的事情。”(《日本文獻裏的中國》，《域外文獻裏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頁)

全部漢籍的近兩成。

江戶時代是中國詩文傳入日本最重要的時期，這主要體現在漢籍傳入方式的改變。奈良、平安時代，漢籍傳入主要依靠遣唐使、留學生、留學僧和渡來人攜帶而來；其後則由少量商人作為貨物輸入，然直至室町幕府，其數量與規模均極有限<sup>①</sup>。德川幕府（1603—1867）時，雖然實行鎖國政策，但以長崎為口岸的中日海上貿易，使得作為大宗商品的漢籍輸入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頒布“展海令”後，渡日貿易的唐船數更是急劇增加<sup>②</sup>，因而包括明代歷朝刊行的各類書籍，以相當迅疾的速度流入日本市場。此時期所輸入的漢籍中，詩文著作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以宮內廳書陵部藏《舶載書目》第九冊五十一番船所載書目為例，該船共載書籍85種，其中詩文類有29種：《唐詩正[聲]》二十六卷六冊、《譚友夏合集》二十三卷六冊、《詩觀初集》十二卷十二冊、《韓文起》十二卷六冊、《李杜詩通》六十一卷八冊、《三蘇文範》十八卷十冊、《唐宋八家文鈔選》十二卷十冊、《歷朝賦楷》九卷六冊、《伊川擊壤集》二十卷四冊、《臨川王介甫先生集》百卷十六冊、《寸碧堂詩集》三卷一冊、《鈍翁類稿》百十八卷二十二冊、《汪泊子善庵遺稿》一卷一冊、《增定歷朝古文必讀》八卷四冊、《黃葉村莊詩集》八卷四冊、《蘇子美全集》十六卷四冊、《詞學全書》十五卷十冊、《詩畝》五十卷十冊、《震川先生文集》二十卷六冊、《文選六臣註》六十卷三十二冊、《古今書牘大全》八卷四冊、《四六全書》四十五卷十二冊、《古文彙鈔》十卷十六冊、《萬首唐人絕句》二十四冊、《王文公文抄》十六卷六冊、《寓林集》三十八卷十六冊、《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二十冊、《今體臺閣集》十卷四冊。又有《左傳文定》十二卷八冊、《周忠毅公奏議》五卷四冊、《皇明奏疏》六卷十冊、《韻府群玉》二十卷十冊、《篇海類編》二十卷十冊等5種屬於廣義文學類著作或者文學類工具書<sup>③</sup>，在全部輸日書籍中占到四成的數量，可見文學作品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

① 參見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序章》第9頁。

② 有關這方面的詳情，可參看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一章《江戶時代漢籍輸入概況》，第19—28頁。

③ 數據據大庭修《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34—36頁統計。

正是以漢籍的貿易為基礎，日本漢詩文創作在更為廣大的人群中獲得快速的發展，而本土漢詩文創作的發展又刺激了漢籍輸入的需求。在此過程中，產生了大量不同類型的漢籍文獻。

一是以各種方式轉輸進入日本的中國文獻，現今仍有相當數量的漢籍收藏於日本各藏書機構，其中部分是在中國已經亡佚的珍稀之本，如靜嘉堂文庫、宮內廳書陵部所藏宋元版古籍、尊經閣文庫所藏稀見明集等。而大量關於中國文獻輸入的各類藏書目錄、舶載書志、賬册等，反映了漢籍傳入日本的種類、過程、方式等信息，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如大庭修《江戸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有相當深入細緻的考察。

二是日本所轉抄、重刻的中國文獻，其中多數加入了訓點以便閱讀，如日本正中二年(1325)禪尼宗澤的刊本《寒山詩》是日本現存最古的和刻本，有假名訓點；也有完全照漢籍原本翻刻的，如日本延文四年(1359)春屋妙葩的刊本《詩法源流》<sup>①</sup>。這些文獻中也有一定數量是中國本土已經亡佚的稀見典籍，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三是以日本學者的眼光和立場所編選的中國文學作品或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註釋、疏解、評論等。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所收很多漢詩文是此類作品。卞東波編《寒山詩日本古註本叢刊》(鳳凰出版社,2017),共收《首書寒山詩》(寬文十一年版,1671)、連山交易《寒山子詩集管解》(寬文十二年版,1672)、白隱慧鶴《寒山詩闡提記聞》(延享三年版,1746)、大鼎和尚《寒山詩索曠》(文化十一年版,1814)等4種日本註解本寒山詩集,又附錄隱元隆琦《擬寒山詩百詠》(寬文六年序刊,1666)一種,是有關這一專類文獻的彙集整理。

四是日本學者所創撰的主要以漢字為載體的詩文作品。《懷風藻》為日本第一種漢詩總集,成書於天平勝寶三年(751),共收錄64人120首漢詩,作者均為當時皇族顯貴,如文武天皇、大友皇子等,其詩從內容到技術風格都深受六朝文學之影響。

<sup>①</sup> 參見大庭修《江戸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第14頁。

《本朝文粹》十四卷，藤原明衡編纂於寬永六年（1629），堀杏庵《新刊本朝文粹序》（內閣文庫藏寬永六年刊本卷首）云：“載詩賦者，有《懷風藻》，有《經國集》，有《秀麗集》。自此已來，學校之設隆而生員芟書田之莠，試科之場開而英才攀臺閣之桂，况乎延、天之至和也，長、寬之累洽也，文章盛行而王公將相論於廟堂，博士秀才議于朝野，家餘累牘，架插萬軸，詞賦之綺雕，誥敕之謹嚴，敘事之體制，議論之精確，于是大備。”是書收錄日本平安時代所創作漢詩文，分為賦、雜詩、詔、敕書、對册、論奏、序等45類，計427篇，反映出日本漢詩文創作在參與人員及撰著數量上都有了大幅發展。又如野呂隆訓《誠意伯詩抄序》總結日本漢詩發展，認為平安為盛，然“時所趨向，在彼中唐以下，限以元、白，爭巧於一聯片句，其盛竟不及倭歌遠矣”；其後則“斯道日陵遲”，而保平亂後“縉紳之作，絕響于此”；直至慶、元以還，“世覃右文之教，化洽宇內，豪傑接踵而起，俊髦駢肩而出，正德、享保之際，於是為盛”，“抱經者私執翰墨之權，其所以潤色鴻業，鼓吹盛世，出于《懷風》《文粹》之上，與海西文萃自夸者，駸駸爭馳，幾將馱過之。斯文之盛，開闢以來所未曾有也”。這裏所稱揚的慶[長]、元[和]、正德、享保，為江戶前中期，日本學者所創撰的漢詩文數量與水準均達到鼎盛。

以上日本漢籍，前兩種的價值主要是在於了解中國詩文傳入日本的時間、規模及方式等；後兩種常被稱為“準漢籍”，主要反映日本漢詩文接受、發展的過程及所形成的自身特點，其所具有的研究價值和使用的研究方法都有所不同。不論中國還是日本學者，對“漢籍”“準漢籍”都予以了較為清晰的辨別，其標準亦並無太多的分歧。當然，學者多依據自身的理解和需要來擇取文獻加以整理及研究，其中長澤規矩也先生的和刻本漢籍文獻整理，是最為值得關注的實踐之一。

## 二、長澤規矩也與日本和刻本漢籍整理

長澤規矩也（1902—1980），字士倫，號靜庵，日本神奈川人。1925年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1961年以《和漢書的印刷及其歷史》獲文學博士學

位。1930年起任職法政大學，1970年退休，獲“名譽教授”稱號。長澤氏為日本中國學會、東方學會會員。所著有《書目學論考》(1937)、《中國版本目錄學書籍解題》(1940)、《支那文學概論》(1951)、《漢文學概論》(1952)、《周易註疏》(1973)、《漢籍整理法》(1974)、《古書目錄法解說》(1976)等。作為日本著名文獻學家，他曾先後為靜嘉堂文庫等30多家藏書單位搜集整理中國古籍，尤其在和刻本漢籍的整理出版方面成就卓著，先後編輯出版了《和刻本正史》《和刻本漢籍隨筆集》《和刻本書畫集成》《和刻本類書集成》《和刻本經書集成》等十餘種大型文獻，基本反映了日本漢籍輸入與本土化的面貌。

《和刻本漢詩集成》於1974年至1979年間編輯出版，分為唐詩篇10輯，收《王勃集》二卷等38種唐人詩集，其中杜甫詩集如《杜律五言集解四卷七言集解二卷》等6種為最多。宋詩篇6輯，收《和靖先生詩集》二卷等31種宋人詩集，其中范成大詩集如《石湖先生詩鈔六卷》等4種為最多。補篇4輯，收45種詩集，除《陶靖節集》十卷一種外，餘皆為金元明清人詩集。其中金元人5種、明人23種、清人16種，以作家而言，其中所收高啓詩集如《高季迪先生大全集(殘)》三卷等4種為最多。總集篇10輯，收《詩紀》等68種詩歌總集，其中古詩6種，唐人詩20種，宋人詩9種，金元人詩7種，明人詩15種，清人詩7種，通代詩4種。

《和刻本漢籍文集》於1977年至1979年編輯出版，共20輯，附別卷《歷代名臣奏議初編》三十一卷。《和刻本漢籍文集》基本以作者時代為序編排，共收79種文集，除諸葛亮《諸葛丞相集》二卷外，唐人文集5種(含總集1種，《李孫文集》，即李習之、孫可之文集)，宋人文集26種(含總集3種，《文謝二公文鈔》《歐蘇手簡》《五老集》)，金元人3種，明人24種(含總集1種，《盛明七子尺牘註解》七卷)，清人15種，通代5種。

長澤規矩也《和刻本經書集成》總題云：“汲古書院開業之初(汲古書院設立於1969年)，我就有影印出版《和刻本正史》的規劃。《隨筆》《唐詩》《宋詩》《諸子》《藝

術》依次刊行後，很榮幸地受到社會的歡迎。”<sup>①</sup>可見整個和刻本漢籍的編輯出版是有計劃的開展。長澤規矩也自二戰後開始搜集和刻本漢籍，於集部文獻尤加關注，加之作為文獻學專家，長澤氏曾經為日本各大學圖書館及靜嘉堂文庫、內閣文庫等藏書機構編訂漢籍文獻目錄，其所能够利用的資源自然較一般學者遠為便利。

長澤氏窮三十年之力撰成《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初於 1976 年由汲古書院出版，1980 年補正重版，《和刻本漢詩集成》等文獻整理出版工作大致是以此著為基礎。《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著錄和刻本漢籍，其中集部又分為楚辭、別集、總集、尺牘、詩文評 5 個小類。別集類著錄 330 種（不含複本，下同），總集類著錄 207 種，尺牘類著錄 34 種，共計 571 種。《和刻本漢詩集成》與《和刻本漢籍文集》所收中國詩文集共 261 種，相對於數量龐大的和刻本漢籍文獻來說，並非窮盡性的整理，應該是經過了編者的選擇。選擇的標準，一是對作者文學價值的判斷，如別集類漢魏六朝共著錄賈誼《賈長沙集》、諸葛亮《諸葛丞相集》、王羲之《集古梅花詩》、陶淵明《陶淵明文集》《陶靖節集》《陶淵明集》《彭澤詩鈔》等 7 種，《和刻本漢詩集成》補篇第一輯收《陶靖節集》十卷首一卷，《和刻本漢籍文集》第一輯收《諸葛丞相集》，賈誼、王羲之詩文集均不收。又，如前所列，杜甫、高啓等收有詩文集數種，《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所著錄陶淵明集計 4 種，而最終僅收錄《陶靖節集》1 種，編者選擇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二是編者對“和刻本漢籍”範圍的認知，這是《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取捨最為重要的一個標準。對於“漢籍”概念，長澤規矩也在《漢籍整理法》中有這樣的看法：“漢籍與和書的區別指向是內容的不同，唐本與和本的區別指向是刊刻地點的不同。”<sup>②</sup>所謂“內容的不同”，是指文本的作者為中國人還是日本人；所謂“刊刻地點的不同”，是就內容相同而言。在和刻本漢籍內容的確認上，《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序》中，長澤規矩也將和刻本漢籍分為 4 種情況：A 漢籍白文，純粹的翻刻本；

① 長澤規矩也《漢籍解題》二，《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十卷，第 62 頁。

② 長澤規矩也《漢籍整理法》，汲古書院 1974 年版，第 6 頁。

B 加入句讀、返點、送假名等；C 包含 AB 兩種情況且增加了頭註（首書）；D 在本文旁加入註釋、批評，在卷首等處附有新的特殊的書名。其中在談到第二點時，長澤氏特別指出：“邦人加入註釋批評等的作品，原則上不能算是漢籍。”就此而言，《和刻本漢詩集成》與《和刻本漢籍文集》是以收錄“和本”而非“和書”為職志的。《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所收各詩文集，多數為中國典籍的重刻本，由日本學者校正並施以日式訓點句讀；而很多帶有日本學者創作性質的“準漢籍”就被排除在外，這是符合長澤氏編輯《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初衷的。甚至為體現這一觀念，長澤氏採用了“割裂”文獻的方法。《明賢詠落花詩》一卷，中島規編，有日本文化十五年（1818）序刊本。是書包括《沈石田詠落花詩三十首》、《唐六如和沈石田落花詩三十首》、《文衡山和答沈石田落花詩十首》、《徐禎卿和答沈石田落花詩四首》及“附錄追和卅律”、《註證》六部分。《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集篇第七輯收此書，僅沈周、唐寅、文徵明、徐禎卿《落花詩》四部分，中島規和詩及註證均未收。是書卷首解題云：“本書附錄七葉邦人所作和詩，今本《和刻本漢詩集成》予以割愛。”則並非所用之本原缺，而是長澤氏依據自己的理解割除了附錄部分。

然而我們也看到，有些“和本”，如題為李攀龍所編《唐詩選》，長澤規矩也《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所著錄日本刊本達 61 種（含複本），其中固然有服元喬《唐詩選國字解》七卷（寬政三年刊本，1791）、千葉玄之《唐詩選掌故》七卷（明和五年刊本，1768）之類日本學者加入翻譯、註釋的“準漢籍”；但亦有僅僅施以訓點校正的刊本，如題“南郭先生考訂”的《李于鱗唐詩選》（有寶曆三年〔1753〕、安永六年〔1777〕、寬政五年〔1793〕、文化十年〔1813〕等多種刊本），這都符合長澤氏關於“和本”的定義，而《和刻本漢詩集成》却並未收錄。此外，《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所收由日本學者獨力編選或對中國詩文加入註釋疏解的著作有七十五種，其中多數可以視作“準漢籍”，如大窪行、山本謹同輯《宋三大家絕句》，大窪行、菊池桐孫同輯《廣三大家絕句》等，這些亦見諸《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而同為日本學者所輯選《唐後

詩》《絕句解》《明文矩》《明文選》等，《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則未收錄，亦不見於《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其原因，部分或是版本難得；然如《唐後詩》《絕句解》等不僅靜嘉堂文庫有藏，《荻生徂徠全集》亦有收錄（1973年東京河出書房新社版），長澤氏未能見到的可能性不大，或是在編輯時有其具體的考慮。

最後，和刻本漢籍諸集編輯於長澤氏晚年，開始編《和刻本漢詩集成》時已71歲；《和刻本漢籍文集》第二十輯出版於1979年3月，翌年11月長澤規矩也即去世，那麼年齡和精力的限制也是《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不能更廣泛擇取的原因之一。畢竟，大型文獻的整理，需要研究者長時間、多階段的努力方能做到相對完備精善。

從編輯體例看，《和刻本漢詩集成》與《和刻本漢籍文集》都是採用按時代和體裁兩種標準編排的方式。所不同者，《和刻本漢詩集成》明確以唐宋元明清及總集分為4篇，而《和刻本漢籍文集》雖亦大致以作者生平時代為序編排，但並未標明。就傳統詩文集的編排而言，以作者時代為序，能夠較為清楚地顯示出文學史發展的脈絡軌迹；但對於和刻本漢籍而言，若以展示日本漢詩文接受樣態為追求，那麼採用以書籍成書或刊刻時間為序的編排方式可能更為適當。

從長澤氏選用和刻本漢籍版本的情況看，總體而言，《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在底本選擇上頗為精審。《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題稱同版本漢籍一般採用初印本，如果有增訂本，則採用後者；其中部分使用了內閣文庫及其他圖書機構的藏書，保證了文獻整理的品質。當然，由於條件所限，部分文獻的版本並非最佳，《和刻本漢詩集成》總題又稱某些版本本以為是初印本，其後又發現了更早的印本，可能已來不及替換。

還有一個問題是，《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所收各書，雖均介紹其版本信息，但於其所藏之地則未能註明。長澤氏自言有使用內閣文庫等機構藏書，然《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未見有各本館藏地之印章，或是在影印時技

術性修去，今天學者很難再對其做復核工作。

總之，《和刻本漢詩集成》《和刻本漢籍文集》無疑是和刻本漢籍第一次大規模的文獻整理，且直到目前仍最為詳備，對於中國詩文在東亞的流播與日本漢詩文接受及發展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 三、關於日本所編明人詩文選集

現存海量之日本漢籍與準漢籍，對於中日兩國學者而言都是重要的文獻資源，如何有效加以整理，以便於研究者使用，是當前兩國學者所面臨的急迫課題。就中國方面看，學界更為關注也著力最多的是日藏稀見中國典籍的發掘整理。如安平秋先生主持的《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楊忠先生等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鳳凰出版社，2013），劉玉才、稻畑耕一郎教授編《日本國會圖書館藏宋元本漢籍選刊》（鳳凰出版社，2013），收錄宮內廳、公文書館、國會圖書館等機構所藏宋元版漢籍，均是珍稀之本。專類文獻方面，黃仕忠教授關於日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的整理頗為顯著，自2006年迄今已有《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與日本金文京教授、喬秀巖博士合作，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第一輯2006，第二輯2016）、《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稀見中國鈔本曲本彙刊》（與日本大木康教授合作，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等出版。和刻本漢籍，尤其是“準漢籍”的文獻整理，最為重要的當屬金程宇教授《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鳳凰出版社，2012），共收和刻本凡經部12種、史部5種、子部34種、集部59種，共110種，又附錄相關文本與研究著作22種。專類和刻本漢籍方面，除前舉卞東波教授《寒山詩日本古註本叢刊》外，即將刊行的張伯偉教授編《日本〈世說新語〉著述彙刊》收日本學者關於《世說新語》的研究著作20餘種。<sup>①</sup>

① 以上詳參徐林平、孫曉《近三十年來域外漢籍整理概況述略》，《形象史學研究（2011）》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劉泰廷《中國近五年域外漢籍研究述評》，《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7年第1期。

日本漢籍文獻目錄的編輯，如沈津、卞東波教授編《日本漢籍圖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收錄日本漢籍書影約 1800 種，“彙集了日本各個時代翻刻的中國典籍的書影，而且還酌量收錄日本學者用漢字完成的註釋、研究中國古典著作的書影，對我們了解中國典籍在日本的流傳與影響有很大的幫助。”<sup>①</sup>杜澤遜教授所承擔《日本藏中國古籍總目》，其收錄範圍是“日本收藏的中國人撰寫的古籍，作者非中國人者不予著錄”，對於“準漢籍”則不收錄，認為“日本人編‘漢籍目錄’時經常另編‘國書目錄’以著錄之，日本學者稱之為‘準漢籍’。這類日本人的著作，日本人編的‘漢籍目錄’是不收的，今編《日本藏中國古籍總目》也不予著錄”<sup>②</sup>。

從日本方面看，大規模的漢籍文獻整理，在長澤規矩也系列和刻本漢籍出版之後，主要是在漢籍目錄的編訂方面，較為重要的如《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雄松堂書店，2015），杏雨書屋所編《新修恭仁山莊善本書影》（武田科學振興財團，1985）等。日本各圖書機構多已編輯漢籍目錄，但在甄別具體書籍性質時，對漢籍、準漢籍的認定則頗有參差，在使用時頗為不便。

對照已有和刻本漢籍整理的實績，以當前所具備之條件及新的研究形勢所提出之要求看，在可能範圍內作專類文獻的窮盡性彙集整理，或是最為科學有效的方式之一。除繼續加強日藏珍稀中國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外，尤其應對和刻本漢籍及包括日本學者所編撰之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作進一步的拓展。有鑒於此，我們計劃彙集日本學者所編中國詩文選集，分為明代、清代及通代三卷依次出版。本次將要刊出的“日本所編中國詩文選集彙刊·明代卷”即是以此為追求的一種嘗試。

選集，是中國傳統詩文集的一種形式，具有存人存詩、衡文取範的作用，甚至承擔著“備一代故實”<sup>③</sup>之史家職志。作家作品是最基本的文學史單位，選刊者無論是基於精英典範的確認抑或蒙學實用的教習，都能顯示其意圖與評斷，因此，在文學經

① 沈津《日本漢籍圖錄序》，《日本漢籍圖錄》卷首，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② 杜澤遜《關於編纂〈日本藏中國古籍總目〉的幾點思考》，《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18年第1期，第3—7頁。

③ 俞憲《盛明百家詩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04冊，第399頁下。

典化的過程中，選集的編定及流傳起了重要的作用。從形式上看，選集有一家之選，有衆家之選，其意旨不同。芥川丹丘《明文選序》云：“文之尚選，其久矣哉！有選一代之文者，將觀人文之盛、鑑治亂之要焉；有選一家之文者，將探論說蘊奧、採辭藻雋麗焉；有選諸家之文者，將覽體制异同、較才思雄劣焉。”和刻本漢籍，單是翻刻之本已然能够體現出中國文學在日本的接受情形；而經日本學者所編輯、評定、註釋、疏證的文本，則體現了日本學者對於中國詩文的價值判斷與甄選眼光，反映出中國文學更爲複雜、深入的接受樣態，有必要對其作全面的梳理。

長澤規矩也《漢詩集成》《漢籍文集》中也包括衆多的詩文選集，其中明代部分計38種。一人之選集，有《王陽明先生文錄鈔》十卷、《滄溟先生尺牘》三卷、《謀野集刪》一卷、《弇園詠物詩》一卷、《弇園摘芳》三卷、《弇州先生尺牘選》二卷、《李空同尺牘》二卷、《弇園詩集》八卷、《謝茂秦山人詩集》五卷首一卷、《袁中郎先生尺牘》二卷、《明徐天目先生尺牘》不分卷、《唐伯虎集》不分卷、《文衡山先生詩鈔》二卷、《方正學文粹》六卷、《王陽明文粹》四卷、《歸震川文粹》五卷、《王遵巖文粹》五卷、《唐荊川先生文集序記部》四卷、《高太史詩鈔》二卷、《青邱高季迪先生絕句集》三卷、《青邱高季迪先生律詩集》五卷（此2種當爲1種）、《誠意伯詩鈔》四卷、《劉誠意文鈔》三卷、朱之蕃《詠物詩》一卷、《宋學士文粹》三卷、《劉戡山文抄》二卷、《陳白沙文抄》三卷、《王陽明奏議選》四卷、《王陽明先生詩鈔》二卷、《五友詩》一卷，共30種。衆家之選集（總集），有《明詩大觀》四卷、《明七才子詩集》七卷、《明九大家詩選》五卷、《盛明七子尺牘註解》七卷、《明七才女詩集》七卷、《明賢詠落花詩》一卷、《列朝詩鈔》二卷、《明詩節義集》三卷，共8種。

“日本所編中國詩文選集·明代卷”共收錄明人詩文選集70種，相較《漢詩集成》《漢籍文集》增加了32種：《大明京師八景詩》不分卷、《唐後詩》三集六卷、《明詩俚評》一卷、《絕句解》不分卷、《絕句解拾遺》不分卷、《明四大家文選》二卷、《龍淵先生選明朝尺牘過雁裁》二卷、《明李王七言律解》二卷、《明文選》四卷、《李滄溟尺牘

《便覽》三卷、《明文批評》不分卷、《弇州先生尺牘解》二卷、《弇州尺牘紀要》二卷、《明七子詩解》七卷、《四家雋》六卷、《嘉靖七子近體集》二卷、《滄溟尺牘國字解》三卷、《絕句解拾遺考證》四卷、《絕句解辨書》三卷、《七才子詩掌故》七卷、《三家絕句》二卷、《丘瓊山忠孝箴勉學詩》一卷、《唐明詩類函》三集十卷、《唐荊川文粹》四卷補一卷、《鼇峰絕句鈔》一卷、《明詩手抄》不分卷、《高青邱詩醇》七卷、《絕句解典故》三卷、《孫忠靖公文抄》三卷、《明詩絕奇》一卷、《高青邱詩鈔》不分卷、《明十家詩選》六卷。這些選集之中，如《四家雋》《唐明詩類函》等編選唐明兩代之詩文者，此次所以收入，是因為江戶時代人們將唐明看作一體，如原直《詩學新論》曰：“爰洎明祖膺錄，斯道復興。或曰：明猶唐也，唐猶明也，而其間雖綿世浸遠，治亂不同乎，方其調相契，幾如魯衛之政兄弟也。”這也是承襲明代復古派的自我評定，直接追配唐人。特別是古文辭派，認為明代最直接繼承了唐詩遺產，而非如一般通代選集，首先是作為朝代的概念，故我們作為特例在此編中予以收錄。又如《明文批評》，雖從性質上看屬於“詩文評類”，然其中所舉李攀龍之文，亦是文選的形式，而其評文之論，真正體現日本學者眼光，故一併收入。當然，這七十種詩文選集，尚非此類文獻的全部，如《李西涯文粹》《明文矩解》《續滄溟先生尺牘》《弇州尺牘國字解》《明詩五絕百首諺註》《滄溟尺牘兒訓》《滄溟先生尺牘諺解》《謀野集便覽》《謀野集拾遺》《明七才子詩集譯說》《前明七子近體詩集》等，因條件所限或其他原因，本次未能收入，俟他日條件許可時再行編入補輯。

綜觀這些詩文選集，大致具有如下特點與價值。

1. 此編依據各選集成書的時間為序編次，成書時間不詳者依刊刻時間，刊年亦不詳者則以編撰者生平而定，從而反映日本學者對中國文學接受在歷時維度上的情形與特點。從各選集的長時段分布上，我們可以看到，自江戶早期的承應二年（1653）直到明治三十一年（1899）共 240 多年間，日本所編中國詩文選集整體上呈現出較為平滑的分佈樣態，並未出現急劇波動的情況，這表明雖然日本學者在文學思想的接